法治日报 LEGAL DAILY
2021年1月6日 星期三
编辑:文丽娟 美编:李晓军 校对:陈维华 电子信箱:fzrbshidian@126.com

浙江高院发布《指引》帮助“诚实而不幸”债务人摆脱债务枷锁

个人破产制度全面推广值得期待

□ 本报记者 陈东升
□ 本报通讯员 王宝奇

● 自2018年底以来,以温州、台州、丽水遂昌为代表的个人破产制度探索便逐步开展,在具有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办理方面实现破冰

●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浙江法院在个人破产制度方面的探索经验为后续制度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和浙江样本

● 个人破产制度是对整个社会观念、文化进行改变的基本规则,目前设立推行的技术问题已经克服,主要是制度规则的跟进问题,关键是要有配套的规则和配套的队伍

个人破产制度探索提速。2020年12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个人破产*)工作指引(试行)》(*以下简称《指引》*),这意味着浙江正式探索个人破产制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五庭庭长鞠海亭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浙江省高院出台《指引》,其宗旨是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与“不诚实”的债务人予以区分,给前者以相对宽松的制度出路,同时对后者以强制执行。

“对于诚信的债务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提供了四项激励机制:一是只要债务人如实申报财产,就能免于上黑名单、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二是一次性解决所有债权债务纠纷;三是能让债务人过上正常生活;四是政府为个人集中债务清理的管理人提供费用,为债务人节约成本。对债权人来说则至少有三项保障:一是摸清财产底数,引入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管理人,可多渠道调查债务人财产,最大可能摸清财产底数;二是债权实现确定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能明确债务人到底欠了多少债,债权人可以知晓自己能获得多少比例清偿;三是增加信任度,引入第三方是对法院的制约,有利于取得债权人对调查结果的信任。”鞠海亭说。

结合实际探索创新 通过办案积累经验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出台个人破产法。现实中,一部分“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陷入困境,丧失再融资、再创业能力,一定程度遏制了社会投资活力。

201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实际上,自2018年底以来,以温州、台州、丽水遂昌为代表的个人破产制度探索便逐步开展,在具有个人破产实质功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办理方面实现破冰。

2019年10月9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平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通报会,通报平阳法院办结的温州某破产企业股东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债务人蔡某系温州某破产企业的股东,经生效裁判文书认定其应对该破产企业214万余元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调查,蔡某仅在其现就职的瑞安市某机械有限公司持有1%的股权(*实际出资额5800元*),另有一辆已报废的摩托车及零星存款。此外,蔡某从该公司每月收入约4000元,其配偶胡某某每月收入约4000元。蔡某长期患有高血压和肾脏疾病,医疗费用花销巨大,且其孩子正就读于某大学,家庭长期入不敷出,确无能力清偿巨额债务。

2019年8月12日,平阳法院裁定立案受理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后,指定温州诚达会计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管理人对外发布债权申报公告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公告后,平阳法院于当年9月24日主持召开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蔡某以宣读《无不诚信行为承诺书》的方式郑重承诺,除管理人已查明的财产情况外,无其他财产;若有不诚信行为,愿意承担法律后果,若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最终蔡某提出按1.5%的清偿比例即3.2万余元,在18个月内一次性清偿的方案。同时,蔡某承诺,该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其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过部分的50%将用于清偿全体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务。

本次参与表决的债权人共4名,债权人一方在充分了解债务人经济状况和确认债务人诚信的前提下,经表决通过上述清理方案,同意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自愿放弃对其剩余债务的追偿权,并同意债务人可以自清理方案履行完毕之日起满3年后,恢复其个人信用。

同时明确,自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六年内,若发现债务人未申报重大财产,或者存在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逃废债行为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恢复按照原债务额进行清偿。

2019年9月27日,平阳法院签发了对蔡某的行为限制令,并终结对蔡某在本次清理所涉案件中的执行。最终,该案得以顺利办结。

温州中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陈卫国对该案进行评析时指出,平阳法院办结的蔡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是最高法提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后全国首例具备个人破产实质功能和相当程序的个人债务清理案件。

截至2020年9月30日,浙江省共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237件,其中台州137件,温州56件,丽水41件;共办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147件,其中台州80件,温州、丽水各33件,绍兴1件。

在债务及清偿方面,浙江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涉案债务总额2.027亿元;在债权人数方面,浙江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涉案债权人共685人;在涉及执行案件方面,浙江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共涉及执行案件712件,涉及执行标的金额2.482亿元。

建立有效区分机制 以挽救诚信债务人

2020年12月3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指引》,提出依法合规、鼓励探索、府院联动三条基本原则,积极探索通过附条件的债务免除、诚信财产申报、合理确定“生活必需品”以实现破产制度中豁免财产的制度目的等途径,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充分探索个人破产的制度因素。

据了解,《指引》共61条,分为11个部分,旨在建立一套有效的区分机制,通过债务人申报、接受债权人质询、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管理人调查核实等措施,将“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债务人(“*老赖*”)与“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予以区分,在对前者强制执行的基础上,给后者以相对宽松的制度出路。债务人的“诚信”是制度运行的前提基础,如债务人有恶意逃债等不诚信行为,则集中清理程序将不予启动或及时终止。

为激励和引导相关利害关系方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指引》明确,针对如实申报个人财产的诚信债务人,人民法院可以免予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拘留、罚款等强制执行措施,可以结合债权人会议审议意见依法决定保留债务人生活必需品,并适当予以相关费用的补贴等。针对债权人,人民法院将引入更多调查核实债务人财产的手段,如管理人资源和破产专项资金等,并确保债务人诚实参与、积极配合,更加全面、彻底地调查核实债务人财产状况,维护债权人正当利益。

在《指引》建立的一套流程中,实现个人破产制度与强制执行制度充分衔接,将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制度等引入强制执行程序,或者说是将强制执行程序中的财产申报等制度回归到破产制度的本位。通过实施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反向助推执行制度回归“强制执行”本位,进一步明确两大制度适用的对象区别: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当事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对确实“诚实”而“没有履行能力的”,可以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进行集中执行,从债务的锁链中解脱出来。

《指引》还结合实际进行最大程度的探索创新,如双重表决规则的设立、将债权人会议审议生活必需品(*豁免财产*)范围的结论作为人民法院相应决定的重要依据、引导债权人作出附条件减免债务的承诺等。

“破产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制度,是市场经济体系的一项基础设施。”浙江高院副院长徐建新说,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浙江法院在个人破产制度方面的探索经验为后续制度立法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素材和浙江样本。

制度落地意义深远 配套规则及时跟进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认为,《指引》借鉴了深圳个人破产条例的做法,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机制上进行了一些突破,这些都是对未来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作出的有益探索。

据广东省律师协会破产与清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林介绍,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似于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和解程序,这项机制显然是在向正规个人破产制度的方向发展。此前,深圳个人破产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大立法,而浙江省高院发布的《指引》对地方法院内部起到司法指引作用。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不是一个过渡性的机制,将来全国层面的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后,个人债务清理机制仍然是需要的,走破产清算程序耗时耗力,涉及个人破产问题,应该采用多种方式同时进行,多管齐下。”卢林说。

北方工业大学银行复苏与处置法治研究中心主任、金融科技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王斐民也提出,《指引》出台正当其时,这是在前期台州、温州以及丽水三个地方试点的基础上进行的经验总结,然后在浙江全省推广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类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制度是在鼓励创业、激励创新的同时宽容失败,若能落地,将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个人创业创新起重大推动作用。

以金融业为例,王斐民说,个人破产制度会促使金融业回归理性。一些民间借贷机构为牟取暴利,会发放利率高但风险也高的贷款。个人破产制度落地后,金融机构就会回归理性,主要用大数据驱动的信用评级找到社会里有信用的个人作为目标客户,而不是像以往那样,让借贷人提供不动产或者是其他人的担保,金融业将得到健康、理性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业也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中诚实守信的人得到便利高效、低成本的融资,而让那些具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清偿义务的个人得不到融资或以更高成本获取融资,进一步强化个人破产制度和民事诉讼法的强制执行制度,这样金融业的发展和法律实施就会形成良性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对诚信债务人“破产保护”后,如何进一步遏制恶意逃废债?

浙江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石一峰认为,打击恶意逃废债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一方面,建立财产登记和查询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信用评价体系,督促债务人及时履行债务;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个人债务清理、个人破产配套法律制度,让债务人有机会重新开始。

那么,距离个人破产制度在全国推行还有多远?

企业破产法起草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表示,个人破产制度是对整个社会观念、文化进行改变的基本规则,目前设立推行的技术问题已经克服,主要是制度规则的跟进问题,关键是要有配套的规则和配套的队伍。

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企业重整与清算业务部主任张继军认为,通过浙江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和总结经验,我们相信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制定全国适用的个人破产制度,使真正因为市场、经营等客观因素导致经营不善的“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摆脱债务枷锁,激励创业者重生,推动经济发展。

制图/李晓军

上接第一版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坚定做好今年工作的信心决心,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以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做好安全稳定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要紧紧围绕今年公安工作的目标任务,咬定青山不放松,脚踏实地加油干,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的落实。

会议要求,要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不断提升公安工作的整体效能和战斗力。要坚定不移走改革强警之路,以实施公安发展“十四五”规划为契机,大力推进公安工作改革创新,努力推动新发展阶段公安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针对岁末年初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的情况,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扎实抓好当前各项安保维稳措施的落实,毫不放松地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全国社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以“三个自觉”为乡村振兴提供优质检察产品

上接第一版 要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严惩侵害农村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安全、侵害农民权益的各类犯罪,确保脱贫攻坚成果不被蚕食。要防止因案返贫,在检察办案中积极开展司法救助,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乡村法治要落实落细,让法治阳光照亮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张军强调,“四大检察”“十大业务”都要在乡村治理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助力提高乡村善治水平。对此,张军划出重点——“农村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绝不能让黑恶势力损害脱贫攻坚成果!要建立健全常态化工作机制,在农村地区再深化、巩固、落实,持续推进扫黑除恶,保护好脱贫攻坚事业成果”;“对于农村地区而言,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要通过公益诉讼检察,保护生态环境和国有、集体土地权益”。

最高检领导、检委会专职委员出席会议。

发挥“六大作用” 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上接第一版

——发挥督导利剑作用,掀起扫黑除恶最强攻势。坚持把督导督办作为传导压力、落地落实的关键一招,以中央督导强推进、特派督导破难题、案件督办扩战果,持续拧紧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链”,推动各地揭开“盖子”、深挖“根子”,有效形成攻城拔寨之势。

——发挥考评激励作用,促进扫黑除恶均衡发展。坚持把通报、考评、表彰作为重要抓手,坚持逐月通报、强化年度考评、抓好总结表彰,发挥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指挥棒”作用,推动各地各有关部门始终保持高昂斗志和持久动力。

——发挥宣传引导作用,形成扫黑除恶磅礴气势。准确把握时度效,创新宣传引导方式,助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宣传氛围。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增强扫黑除恶示范效应。始终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努力当好专项斗争的“排头兵”,促进各地各部门攻坚克难、扎实推进。

平安桥头堡守护群众安全感

上接第一版

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是六安四级综治中心的实战平台,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向上接受市、县两级综治中心指挥调度,直接实施平安建设和处置化解重大矛盾风险;向下指挥调度村级综治中心,筑牢平安建设的前沿阵地。

“六安市委、市政府设立市综治中心,是全市四级综治中心的‘指挥大脑’,主要任务是统筹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助推民生服务、协调各方履责。”高斌说,市综治中心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不仅可以指挥调度县级综治中心,还可以直接调度、督察镇村综治中心。

目前,六安市综治中心投入200余万元先期建成了市级综治视频图像信息交换共享分平台,形成统一指挥、集中管控、分级负责、多级联动的实战化应用体系,实现视频指挥调度、网格服务监管、治安事件监控等功能。

“县级综治中心的定位是打造‘上联省市、下联乡镇、横联部门’的数据枢纽中心。”见到金寨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程东中时,他正在铁冲乡综治中心通过视频巡查该乡两省三县交界(*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商城县和固始县*)治安防控情况。

按照“枢纽中心”的定位和统筹融合、实体实效的原则,六安市各个县区综治中心建设做到了“四个落实”,即落实机构人员编制、落实办公场所、落实“四网融合”(*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系统、综治9+X信息系统、综治视联网视频会议系统、网格化指挥调度系统*)、落实工作机制和制度。

为了发挥村(社区)综治中心“耳聪目明”作用,六安市要求村(社区)综治中心在实现有人员干事、有场所议事、有保障办事、有制度理事的基础上,重点通过做实网格化服务管理,不断夯实化解矛盾纠纷、管控特殊人群、组织群防群治、开展为民服务主阵地。

“四个引领”强规范

“居住地附近夜间单独出行,您是否担心自己的财产或人身安全?”

“您家附近出现矛盾纠纷、社会治安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处理?”

……

在六安市叶集区委政法委不定期向群众调查的问卷上,所列问题都涉及综治中心的日常工作。

六安市实施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不仅仅体现在人、财、物等硬件要求上,更体现在综治中心职能强化上。

六安市委政法委制定了《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指导意见》,并对申报达标的乡镇和村(社区)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进行督查验收,确保合格一个、申报一个、验收一个。

县区综治中心的“标配”基本上都有100多平方米的办事服务大厅,除了服务群众的办事窗口,还有视频指挥中心、网格化调度室、矛盾纠纷调处室、心理咨询室等。在做到“六个有”基础上,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还要实行“四统一”,即:统一制作标牌,统一工作职责,统一组成人员,统一津贴待遇。

为提高实战效能,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将原来分散设立的综治维稳、信访接待、司法调解等3个中心,采取“三合一”方式,全部整合到新组建的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建立了首问负责、服务承诺、限时办结、跟踪回访等机制,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在智能引领上,各县区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平安建设新模式,将社会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基层“神经末梢”。

“为了实现各级综治中心的标准化建设,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标牌由六安市委政法委统一制作,村(社区)综治中心标牌由县区委政法委统一制作。”六安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刘文说,通过标准引领、实战引领、服务引领、智能引领,各级综治中心建设有章可循,得以迅速推进。

截至目前,六安市、县区综治中心已全部实现规范化运行,县区矛盾纠纷系统已实现和部门、乡镇的全线对接;86个乡镇综治中心申报达标,占总数的61.4%,其他乡镇将于近期完成建设任务;1888个村(社区)申报达标,达到97.4%。

“四个转变”惠民生

“小板凳、大平台,老百姓、晓政策……”一阵清脆的快板声引起群众阵阵叫好。

这是不久前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三元镇三元社区的一场“板凳会”上看到的情景。今年以来,这样的“板凳会”三元镇已经举办了99场。镇村干部与村民坐在板凳上面对面交流、零距离沟通,拉近了和群众之间的感情。

“镇村干部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不再是高高坐在台上,让我们找到了过去的感觉,有话也好说了。”叶集区三元镇三元社区三星村民组村民张天海说,他加入村综治中心组织的巡逻队,就是觉得自己得为平安建设做点事。

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工作中,守护平安的力量大了,矛盾少了,最终惠及的还是群众。

“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赋予了平安建设实战化平台,通过整合力量,补上了以往孤兵作战的短板。”金寨县委政法委副书记李鸿新深有感触地说。

作为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的配套工程,六安市印发了《关于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线上线下联动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对综治“9+X”矛盾化解子系统进行升级完善,规范矛盾纠纷“线上”流转,建立“一地受理、一键分流、一网融合、一元统筹”“四个一”工作机制,同时“线下”推动“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建设,形成了群众诉求“网上网下”快速受理、联动办理、及时反馈机制,提高了解决群众诉求的效率和质量。

刘文说,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带来了四个转变:“小治安”向“大平安”转变,“孤兵作战”向“立体联防”转变,“传统粗放”向“智慧精细”转变,“单一分散”向“多元整合”转变,为平安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多年来,六安市积极推动平安建设由部门工作转变为党政工程,跳出“小治安”,迈向“大平安”,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的市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强化组织领导,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的良好格局。市委、市政府分别与各县区党委、政府签订《2020年度平安建设目标管理责任书》,明确职责任务,压实工作责任,确保综治、维稳、防范、信访等各项平安建设工作落实落细、落地见效。通过强化乡镇综治中心的统筹协调职能,整合公安、司法、信访、应急管理等部门资源,着力培养基层社会治理的“全科医生”,推动一站式解决群众诉求、一揽子提供群众服务、一体化守护社会平安,将过去孤兵作战的独斗模式转变为立体联防的共治模式,实现基层治理的协同合作。

平安建设的重点在基层、关键是基础。高斌认为,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夯实了基层平安建设基础,硬化了基层社会治理手段,提升了服务群众能力,拓展了群众参与的途径,“尤其是稳定了队伍、激发了热情,达到了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作推进在一线、感情融洽在一线的目标”。

市域社会治理“试验田”百花齐放

上接第一版 专属网格4050个,配齐配强专兼职网格员43300多人,实现了信息在网格采集、需求在网格发现、隐患在网格排查、环境在网格维护、服务在网格开展。

一个网格就是一个“堡垒”、一个“家园”。随着网格化服务管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山东省东营市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渐入佳境。

东营市打造形成了全时空布局、全方位保障、全过程覆盖的社会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2019年以来,该市累计流转办理网格事件200余万件,巡查处理隐患问题40余万件,参与调处矛盾纠纷1万余件,事项办结率99%以上,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强化网格运行管理,筑牢基层治理根基。

江西省赣州市委政法委二级巡视员明经科介绍说,赣州市逐步将基层网格整合为社会治理网格,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社会救助等工作,打造“全要素网格”,形成“闭环式”工作流程。

福建省龙岩市整合党建、政务、综治、城管等各类网格,推进“多网融合”,做到“区中有网、网中有格、格中有人、人能办事”的良好社区“微循环”。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将全市重新整合划分为786个线上线下统一的电子网格和地理网格,并将对应的专职网格员统一编码管理,建立起规范化网格管理体系,实现“全域网格”,市域社会治理能力水平再上新台阶。

“智能化”带来“新亮色”

牲畜闯进铁路范围,当即就被发现,几分钟就处置完毕,这是重庆市长寿区利用智能化“电子围栏”保障铁路安全的一幕。

围绕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重庆市坚持城乡一体推进,强化科技支撑、智慧赋能,“智慧治理”成效渐显。

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

浙江省杭州市以“城市大脑”为中枢,建立“城市大脑·平安建设(社会治理)数字化系统”,通过整合各部门和社会主体数字资源,打造市域治理智能化中枢工作平台,推动社会治理从“灭火”向“防火”、从处置向预防转变。嘉兴市南湖区打造“网格连心、组团服务”社会治理研判指挥平台,实现“一图感知”归集数据信息,“一体指挥”优化连心服务,“一网作战”化解矛盾纠纷,推动部门协作更高效、更智慧。

福建省厦门市加快市域社会治理协同平台建设,以数据生命力提升治理行动力,创新研发“大数据 扫黑除恶”、高危矛盾纠纷预警、平安综治动态考评等实战应用模块,利用厦门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特别是城市公共安全平台的数据共享服务,实现了平台联通、数据融通、智能分析,有力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水平。

一系列智慧成果广泛应用,成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一抹新亮色。

贵阳市依托“贵阳政法大数据工程”建设,建立全市统一的社会治理指挥调度平台,发挥“12345”公共服务热线海量治理数据优势,整合人社、卫健、交通运输等26家部门53条热线,形成前端采集“情报源”、中端构建“情报池”、末端集成“情报云”的全流程数据收集、处置和研判体系,着力打造综治中心“智慧大脑”。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上新庄镇在全镇各村中推行为民代办制和“马上帮”信息平台系统,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上门为群众代办事务、给群众宣讲党的强农惠农政策,为群众办事大开方便之门。

2020年六七月间,长江流域洪涝灾害频发。湖北、湖南、浙江、四川、安徽等地积极开拓思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用于水灾防治,数智研判、统筹合力、靶向治理效能充分显现。

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天津、广东、浙江等地依靠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融合网格化管理、健康码等应用,通过精准健康监测,实时动态管理,为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智慧赋能,成效显著。

“独角戏”变为“交响曲”

在赣州市章贡区,总能看到这样一群“红马甲”,她们活跃在大街小巷、乡村社区,或到贫困户、留守老人家中走访慰问、交友谈心,或帮社区邻里化解矛盾、调处纠纷,她们就是“章贡大妈”。

如今,“章贡大妈”志愿服务队已近千人,并建立起区镇村三级队伍网络,积极开展文明劝导、治安巡逻、纠纷调解、政策宣传等工作,广受好评。

独木不支,孤掌难鸣。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身于平安建设,志愿服务,延伸市域社会治理的触角,让“独角戏”变为“交响曲”。

近年来,浙江丽水志愿服务事业持续发展,全市志愿者服务队伍已超过3100支,注册志愿者人数74万余人,超过户籍总人口的25%,涌现出莲都“小荷”、松阳“小青松”、青田“侨乡帮”、庆元“花菇朵”等一批志愿服务子品牌。

湖南省长沙市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智慧手段,研发“互联网+群防群治”的“星城园丁”App,将巡逻防控、违法举报等纳入其中,一站式解决,高效率处理。

济南市加大孵化培育、人才培养、资金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互助调解类等社区社会组织,如今全市已建成社会组织服务(孵化)平台300余处,登记(备案)社区社会组织4129个,持证社会工作者5415人,注册志愿者100万人,聚集起社会共治的磅礴力量。

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创新探索蹄疾步稳。

各地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道路上一路扬帆远航,打造出一个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样板”,带动更多地方实现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推动“中国之治”走向新境界。

本报北京1月5日讯